

专栏导言

高士华

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对面,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事实。而且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有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更加隐蔽,具有很大迷惑性,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栏目发表的两篇文章:王刚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的制作和流转(1907—1916)》和王微笑的《朝鲜史编修会的复本制作及其底本考——以朝鲜燕行文献为例》,就着力揭示了日本自上个世纪初起在东亚范围内为侵略所做的情报或文化准备。

近代日本出于全面侵华的目的,对中国的调查,极其处心积虑:陆军参谋本部主要侧重军事方面,中国的地志、军事设施和军队是其调查中心;满铁调查部持续追踪东北及华北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也以“学术研究”为名开展资源分布与抗战能力评估,1939 年满铁调查部完成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为侵略战争提供评估根据。

除了这两个机构以外,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最为系统。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在 1898 年成立的民间外交团体,表面主张中日提携,实则具有鲜明的协助政府进行殖民侵略性质。1901 年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创办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的“大旅行”项目,覆盖中国 90% 以上区域,调查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所有中国省份,它通过该校 2000 多名学生,持续 40 年对中国进行军事地理、经济资源的系统性调查,出版了大量出版物和未出版的资料。2016—2017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相继整理、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及其“续编”450 册,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资料条件。

王刚的文章聚焦于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报告书的制作、流向,及其与日本军方的关系这一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指出 1907 年至 1916 年间的调查报告书仅有一部“正本”,“副本”是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制作三

部,并全部提交外务省,再由外务省分别转送陆军参谋本部和农商务省。调查报告提供给陆军参谋本部,会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参考资料,是不言自明的。此外,东亚同文会还出版面向日本社会的《支那省别全志》等出版物。《支那省别全志》经过处理删减,已经看不出调查的本来目的,所以也蒙蔽了一些人,认为东亚同文书院只是在做单纯的社会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由外务省直接控制,虽然出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国际主义反战人士,他们在革命感召下转变立场,成了反法西斯斗士;但这毕竟是少数,并不能改变该校的性质。处在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的时代,即使多数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可能不完全了解调查的目的,但调查的数据会被怎样使用,也能猜测出来吧。

20 世纪上半叶,中村荣孝等朝鲜史编修会官员在朝鲜半岛、日本及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大规模史料采访,又以此为基础,借助抄写、摄影等手段,制作了大批复本类文献。王微笑的文章讨论了其中燕行文献复本的问题。朝鲜史编修会隶属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其核心任务当然是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侵略行径编织“合法性”。朝鲜史编修会很努力,搜集范围涉及日本本土、对马岛及中国东北地区,由其制作的复本也因此成为朝鲜史编修会建构殖民史观的基础史料。而其所据燕行文献的底本多为朝鲜世家秘藏珍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百年来,一些底本已踪迹难觅,复本尚得以保存。朝鲜史编修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作者的结论是:“地方史料采访绝非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服务于殖民当局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一环。”可谓一语中的。

朝鲜史编修会的做法似乎和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存在矛盾,是毁灭还是保存?其实并不矛盾,朝鲜史编修会的做法是军事占领的延伸,是通过解构本土文化认同来实现永久殖民的目的,淡化朝中传统宗藩关系,强调所谓“日鲜同源论”,为殖民统治提供“历史依据”,才是朝鲜史编修会的真正目的。毁灭和重构是日本推行文化殖民统治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路线。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中国,在朝鲜半岛,不遗余力地进行资料调查,在文献搜集整理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客观上保留了一些数据和资料,但其行动的指向和目的都是一个:为侵略服务。虽然参加者个人目的或有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不管参加者是否意识到,这是改变不了的。